

内部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

——基于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检验

李兰云,王宗浩,阚立娜

(陕西科技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21)

[摘要]以2012—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代理成本为中介变量,构建中介模型,探讨内部控制对代理成本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以及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研究表明:内部控制正向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代理成本在内部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即内部控制可以通过降低代理成本来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中代理成本在内部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部分中介效应更加显著。

[关键词]内部控制;代理成本;企业社会责任;公司治理;资本结构;国有企业;市场化进程;信息披露质量

[中图分类号]F275.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3114(2019)01-0028-09

一、引言

近些年来,我国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产品质量、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社会责任问题频繁发生,这已经引起了政府、公众、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和学者们的关注,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成为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我国《公司法》第5条明确要求“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学者们从不同方面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程度和效果的影响因素,内部控制和代理成本就是其中的重要影响因素^[1-7]。

学者们关于内部控制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相互影响的研究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有效的内部控制可以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Halebian等认为董事会和管理层可以通过改善企业内部控制环境,进而在保证企业经营良好运转的同时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8]。彭珏等的研究表明,良好的内部控制能够改善企业的决策,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可以正向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水平,并且在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内部控制越能更好地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2]。张礼涛等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内部控制对不同利益相关者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影响存在差异^[3]。另一种观点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有助于提高内部控制质量。Kim等认为社会责任感越强的企业越愿意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制度规范来报告财务报表信息^[9]。李易坤等通过对哈药环保事件的研究发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内部控制环境建设的基础和保障,即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提高其内部控制环境建设水平^[10]。

学者们对于代理成本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关系的研究,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收稿日期]2018-07-31

[基金项目]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CJY028)

[作者简介]李兰云(1968—),女,陕西西安人,陕西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会计理论与实务,邮箱:lily@sust.edu.cn;王宗浩(1993—),男,河南禹州人,陕西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财务管理;阚立娜(1982—),女,河北廊坊人,陕西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财务管理、农村金融。

当企业面临合法性压力时,代理成本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之间呈显著的 U 型关系^[4]。李姝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研究发现,大股东与企业经理人之间的代理冲突越严重,管理者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动机就越强烈,越愿意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缓解代理冲突^[5]。与此相反,雷振华以 2011 年沪深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越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就越低,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中的代理成本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更大^[6]。

在内部控制与代理成本之间关系的研究方面,Abbott 等研究发现,良好的内部控制能够帮助外部投资者更加清楚地了解公司内部真实信息,提升公司信息透明度,完善对管理人员的监督和激励体系,有效减少管理者的利己行为^[11]。企业完善内部控制建设可以大幅降低管理者错报财务信息的风险,并且有效的内部控制有助于抑制管理层的盈余操纵行为,能够进一步提升盈余质量^[12]。杨玉凤等实证检验了内部控制质量对显性代理成本和隐性代理成本的影响,发现内部控制对隐性代理成本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对显性代理成本和隐性代理成本具有综合抑制作用^[13]。杨德明等研究发现,企业可以通过提升内部控制质量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可靠性以及企业信息的透明度,从而有效缓解公司股东与代理人以及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14]。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回顾我们可以发现,内部控制、企业社会责任和代理成本两两之间都存在相关关系,内部控制在降低代理成本和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方面都有着积极作用。由于研究角度和衡量指标不一致,关于内部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的互动关系以及代理成本如何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学者们未能得出一致结论。而关于内部控制与代理成本之间关系的研究,国内外学者所得结论趋于一致,即有效的内部控制可以降低代理成本。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真正将内部控制、企业社会责任与代理成本联系起来,探讨三者之间相互作用机理的文献相对较少。因此,本文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内部控制是否可以通过缓解经理人与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降低代理成本来提高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水平。同时,本文试图采用我国 A 股上市公司的相关财务数据,通过实证方法探讨内部控制、代理成本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揭示企业社会责任与内部控制的内在机理,旨在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制度规范,加深对内部控制功能的认识,探索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有效途径。

二、理论分析

(一) 内部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企业作为经济组织,除了通过生产经营活动创造经济效益来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之外,还需要作为社会中的重要一员来关注员工、顾客、供应商、债权人等相关利益者的利益。履行社会责任既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企业竞争战略的一种选择,那么如何保证企业社会责任的切实履行呢?卢代富认为完善公司治理制度是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重要保证^[15]。Johnson 等、宋建波等和陈智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有效的公司治理正向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健全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有助于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16-18]。杨雄胜认为,内部控制是公司治理的具体制度,保证内部控制的有效实施是公司治理的基本前提^[19]。公司治理是通过内部控制而作用于企业行为的,内部控制具有直接促进组织决策规范的功能,这说明内部控制才是作用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直接因素。李志斌基于内部控制的溢出效应视角研究发现,内部控制作为公司治理的基础制度和自律系统直接作用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1]。王海兵等认为,企业内部控制所面临的最大风险主要是来自于股东、债权人、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的企业社会责任风险,而高效的内部控制作为企业风险识别和风险控制的重要机制之一,能够有效地预防和遏止各种可能损害企业利益、声誉和形象的风险行为^[20]。2010 年,我国财政部等五部委颁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 4 号——社会责任》,明确提出“企业要加强安全生产、保证产品质量、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促进就业、维护员工利益等方面的内部控制建设”,这说明企业社会责任已嵌入内部控制建设中。内部控制的目标框架中包含企

业对社会责任的追求,内部控制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方面,在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以及提高风险防范能力的同时,能够使企业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促使企业制定有效的社会责任战略规划,改善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H₁: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有效的内部控制可以提高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水平。

(二) 内部控制与代理成本

由于委托-代理会导致信息不对称性,因此企业经理人可能存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Grossman 等认为,经理人可以获得委托人无法获得的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优势来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进而损害股东和相关投资者的利益^[21]。那么,应该如何有效地降低代理成本,进而缓解管理者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呢? Ashbaugh-Skaife 等研究发现,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其经理人更容易操纵会计信息,而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公司的财务会计信息质量就越可靠,会计的盈余质量就越高^[22]。毛洁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提升内部控制质量能够有效缓解股东与代理人之间的矛盾^[23]。内部控制作为公司内部治理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能够帮助外部投资者更加清楚地了解公司内部真实信息,缓解信息不对称性程度,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降低管理者操纵会计盈余的可能性。同时,内部控制也是公司激励和监督方面的制度安排,在合理而有效的内部监督与激励机制作用下,经理人更有可能做出对股东和企业有利的决策。从激励方面来看,内部控制对管理层的激励会使得他们与股东的目标趋同,减少管理层利用私有信息谋取私利、侵害股东利益的行为,进而缓解企业的代理问题。从监督方面来说,经理人的自利行为会受到内部控制制度的约束,进而可以有效减少其偷懒或者偏离股东利益的行为,起到降低代理成本的作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

H₂: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有效的内部控制可以显著降低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代理成本。

(三) 内部控制、代理成本与社会责任

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说,任何经济人都是基于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而进行行为决策的。当股东与经理人之间存在严重的代理冲突时,经理人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可能不会积极主动地去履行企业对股东、债权人、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7]。这是因为履行社会责任不一定会带来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企业经理人的报酬是建立在公司经营绩效基础之上的,社会责任的履行必然会耗费一定的成本,使得企业的资源浪费在不必要的活动上,从而降低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当然,经理人在实施自利行为时,为掩盖其利益侵占行为,会在公司进行财务会计报告信息披露时操纵会计盈余和隐瞒一些真实信息,更倾向于少披露或不披露自愿性的社会责任信息^[6]。作为企业内部治理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和经营管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内部控制始终贯穿于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全过程,在内部控制有效的情况下,企业经理人更有可能做出有利于股东和企业价值的决策。同时,良好的内部控制能够抑制经理人利用私有信息谋取私利和侵害股东、债权人、员工等利益相关者利益的行为,缓解代理冲突,预防和遏止各种可能损害企业利益的不当行为,进一步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3。

H₃: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内部控制可以通过降低代理成本来提高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水平。

企业产权性质的差异一直是我国学术界关注的话题。关于产权性质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的研究,崔秀梅等认为,在强制性社会责任的履行方面,国有企业明显强于非国有企业^[24];冯丽丽等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重视程度明显高于非国有企业^[25]。基于我国独特的经济体制和制度背景,相对于非国有企业来说,国有企业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职责,不仅要合法经营,实现企业经营的可持续发展,还要承担起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保障就业、配合政府调控等社会职责。由于国有企业的管理制度更加完善,权力制衡作用更加明显,企业管理者通过避开内部控制获取私利的可能性更低,相反可能会通过更加隐蔽的手段来谋取私利,因此,国有企业通过完善内部控制制度来缓解代理冲突进而促进社

会责任履行的效果并不明显。而对于非国有企业来说,公司管理体系相对于国有企业存在一定缺陷,因此企业所有者更有可能通过规范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加强内部控制实施效果来完善公司治理体系,促使经理人减少自利行为,最终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4。

H₄: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通过内部控制降低代理成本来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效果更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2—2016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并根据研究所需剔除以下样本:(1)金融、保险类行业样本;(2)交易状态为ST、PT的公司;(3)财务数据缺失的公司。经筛选,本文最终获得10769个样本数据。为了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我们对研究中涉及的主要连续变量进行1%和99%水平的Winsorize处理。内部控制数据来自迪博(Dib)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数据库,企业社会责任数据来源于和讯网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评分,其他相关财务数据主要来自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数据处理和回归分析主要运用Excel、Stata14.0软件。

(二) 变量定义

1. 企业社会责任(CSR)。借鉴赵蓓等的研究方法^[26],本文利用和讯网发布的2012—2016年企业社会责任评级总得分来衡量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水平。评级总得分越高,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越高,承担社会责任的积极性越高。

2. 内部控制有效性(LnIC)。借鉴李志斌、彭珏等的研究方法^[1-2],本文以迪博·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2012—2016)作为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替代变量,其取值范围为(0,1000)。我们对内部控制指数取自然对数,数值越大,表明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内部控制有效性越好。

3. 代理成本(AC)。国内外学者对代理成本的度量方法不尽相同,本文借鉴Ang等的研究中代理成本的计算方法^[27],采用管理费用率来进行衡量,即用管理费用与营业收入的比值表示,比值越大,表示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冲突越严重,代理成本越高。

4. 产权性质(State)。我国上市公司的产权性质具有鲜明的特征,可以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赋值为1,非国有企业赋值为0。

5. 控制变量。本文选择的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公司财务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Size)、财务杠杆(Lev)、企业成长性(Growth)。同时,考虑到公司治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影响,本文选用是否两职合一(Tds)、股权集中度(Top5)、审计师特征(Audit)、独立董事比例(Indp)、高管持股比例(Mo)、董事会规模(lnbd)以及高管薪酬(lnsal)作为控制变量。此外,本文还控制了年度(Year)效应和行业效应(Ind)的影响。

各变量的具体定义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表

| 变量类型 | 变量名称 | 变量符号 | 变量定义 |
|-------|---------|--------|---------------------------|
| 被解释变量 | 企业社会责任 | CSR | 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总得分取自然对数 |
| 解释变量 | 内部控制有效性 | LnIC | 内部控制指数取自然对数 |
| | 代理成本 | AC | 管理费用/主营业务收入 |
| | 产权性质 | State | 国有企业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
| 控制变量 | 企业规模 | Size | 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
| | 财务杠杆 | Lev | 年末资产负债率 |
| | 企业成长性 | Growth | 营业收入增长率,营业收入增长额与上一年营业收入比值 |
| | 两职合一 | Tds | 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否为同一人,是取值为1,否取值为0 |
| | 股权集中度 | Top5 | 第一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 |
| | 审计师特征 | Audit | 审计事务所为“四大”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
| | 独立董事比例 | Indp | 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总人数的比例 |
| | 高管持股比例 | Mo | 高管持股占总股本的比例 |
| | 董事会规模 | Lnbd | 董事会规模的自然对数 |
| | 高管薪酬 | Lnsal | 前三名高管薪酬的自然对数 |
| | 行业效应 | Ind | 虚拟变量 |
| | 年度效应 | Year | 虚拟变量 |

(三) 模型设计

为了检验所提假设,借鉴温忠麟等的研究^[28],本文构建如下三个回归模型:

$$CSR = \beta_0 + \beta_1 LnIC + \beta_2 State + \beta_3 Size + \beta_4 Lev + \beta_5 Growth + \beta_6 Tds + \beta_7 Top5 + \beta_8 Audit + \beta_9 Indp + \beta_{10} Mo + \beta_{11} Lnbd + \beta_{12} Lnsal + \beta_{13} Year + \beta_{14} Ind + \varepsilon_1 \quad (1)$$

$$AC = \alpha_0 + \alpha_1 LnIC + \alpha_2 State + \alpha_3 Size + \alpha_4 Lev + \alpha_5 Growth + \alpha_6 Tds + \alpha_7 Top5 + \alpha_8 Audit + \alpha_9 Indp + \alpha_{10} Mo + \alpha_{11} Lnbd + \alpha_{12} Lnsal + \alpha_{13} Year + \alpha_{14} Ind + \varepsilon_2 \quad (2)$$

$$CSR = \eta_0 + \eta_1 LnIC + \eta_2 AC + \eta_3 State + \eta_4 Size + \eta_5 Lev + \eta_6 Growth + \eta_7 Tds + \eta_8 Top5 + \eta_9 Audit + \eta_{10} Indp + \eta_{11} Mo + \eta_{12} Lnbd + \eta_{13} Lnsal + \eta_{14} Year + \eta_{15} Ind + \varepsilon_3 \quad (3)$$

其中, β_1 、 α_1 与 η_2 用于判断中介效应, η_1 用于判断直接效应。中介效应检验一般包括三个步骤: 第一步, 首先做企业社会责任对内部控制的回归, 以检验内部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回归系数 β_1 是否显著。若显著, 则进行下一步检验; 若不显著, 则停止检验。第二步, 做中介变量代理成本对内部控制的回归, 以检验内部控制与代理成本的回归系数 α_1 是否显著。若显著, 则进行下一步检验; 若不显著, 则停止检验。第三步, 将中介变量代理成本放入第一步的回归方程中进行检验, 以检验代理成本的回归系数 η_2 是否显著。若显著, 则进一步分析内部控制的回归系数 η_1 是否显著, 不显著说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显著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若不显著, 则说明不存在中介效应。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表 2 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企业社会责任 (CSR) 的最小值为 0.476, 最大值为 4.347, 可见不同企业间社会责任的履行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内部控制指数 (LnIC) 的最小值为 6.155, 最大值为 6.736, 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的差距不太大, 说明我国大部分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在不断完善, 内部控制能力显著提高。代理成本 (AC) 的最小值为 0.009, 最大值为 0.388, 两者差距非常明显, 说明个别公司的代理成本非常高, 代理问题尤为突出。从控制变量的结果来看, 上市公司在资本结构、股权结构、经营能力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异。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 变量 | N | 最小值 | 最大值 | 均值 | 中位数 | 标准差 |
|--------|-------|--------|--------|--------|--------|--------|
| CSR | 10769 | 0.476 | 4.347 | 3.131 | 3.157 | 0.683 |
| LnIC | 10769 | 6.155 | 6.736 | 6.503 | 6.511 | 0.097 |
| AC | 10769 | 0.009 | 0.388 | 0.095 | 0.084 | 0.067 |
| State | 10769 | 0.000 | 1.000 | 0.415 | 0.000 | 0.493 |
| Size | 10769 | 19.815 | 25.999 | 22.131 | 21.951 | 1.257 |
| Lev | 10769 | 0.048 | 0.856 | 0.425 | 0.415 | 0.206 |
| Growth | 10769 | -0.392 | 1.517 | 0.143 | 0.089 | 0.331 |
| Tds | 10769 | 0.000 | 1.000 | 0.236 | 0.000 | 0.424 |
| Top5 | 10769 | 19.650 | 87.670 | 53.079 | 53.29 | 15.365 |
| Audit | 10769 | 0.000 | 1.000 | 0.064 | 0.000 | 0.246 |
| Indp | 10769 | 0.333 | 0.571 | 0.373 | 0.333 | 0.053 |
| Mo | 10769 | 0.000 | 0.667 | 0.123 | 0.002 | 0.192 |
| Lnbd | 10769 | 1.098 | 2.890 | 2.144 | 2.197 | 0.199 |
| Lnsal | 10769 | 11.479 | 17.406 | 14.246 | 14.222 | 0.679 |

(二) 相关性分析

表 3 为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内部控制质量 (LnIC) 与企业社会责任 (CSR)

在 1% 的水平下正相关, 初步说明内部控制可以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代理成本 (AC) 与企业社会责任 (CSR) 在 1% 的水平下负相关, 初步说明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成本降低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水平。企业规模 (Size) 与财务杠杆 (Lev) 的相关系数为 0.543, 说明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多重共线性。然而, 我们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后发现, 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值均小于 2, 平均值为 1.39, 说明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3 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 变量 | CSR | LnIC | AC | State | Size | Lev | Growth | Tds | Top15 | Audit | Indp | Mo | Lnbd |
|--------|-----------|-----------|-----------|-----------|-----------|-----------|-----------|-----------|----------|-----------|-----------|-----------|----------|
| CSR | 1.000 | | | | | | | | | | | | |
| LnIC | 0.325*** | 1.000 | | | | | | | | | | | |
| AC | -0.178*** | -0.157*** | 1.000 | | | | | | | | | | |
| State | 0.097*** | 0.038*** | -0.192*** | 1.000 | | | | | | | | | |
| Size | 0.291*** | 0.196*** | -0.377*** | 0.372*** | 1.000 | | | | | | | | |
| Lev | -0.024** | -0.007 | -0.351*** | 0.314*** | 0.543*** | 1.000 | | | | | | | |
| Growth | 0.102*** | 0.185*** | -0.091*** | -0.133*** | 0.028*** | 0.022** | 1.000 | | | | | | |
| Tds | -0.043*** | -0.019* | 0.091*** | -0.275*** | -0.178*** | -0.138*** | 0.049*** | 1.000 | | | | | |
| Top5 | 0.159*** | 0.147*** | -0.133*** | 0.039*** | 0.180*** | -0.053*** | 0.046*** | 0.001 | 1.000 | | | | |
| Audit | 0.159*** | 0.133*** | -0.097*** | 0.154*** | 0.374*** | 0.121*** | -0.038*** | -0.076*** | 0.187*** | 1.000 | | | |
| Indp | -0.008 | 0.007 | 0.048*** | -0.060*** | 0.007 | -0.024** | -0.005 | 0.111*** | 0.043*** | 0.038*** | 1.000 | | |
| Mo | -0.035*** | 0.016 | 0.162*** | -0.481*** | -0.342*** | -0.356*** | 0.120*** | 0.244*** | 0.131*** | -0.128*** | 0.086*** | 1.000 | |
| Lnbd | 0.097*** | 0.053*** | -0.120*** | 0.262*** | 0.283*** | 0.181*** | -0.028*** | -0.185*** | 0.016* | 0.097*** | -0.512*** | -0.204*** | 1.000 |
| Lnsal | 0.296*** | 0.171*** | -0.082*** | 0.062*** | 0.447*** | 0.133*** | 0.062*** | -0.015 | 0.094*** | 0.230*** | -0.006 | -0.122*** | 0.126*** |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水平下显著。

(三) 回归结果分析

表4中模型(1)和模型(2)为直接效应的回归结果。本文将2012—2016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分别采用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混合回归模型进行检验,通过F检验和豪斯曼检验发现,拒绝混合回归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最后选择采用随机效应模型的结果进行实证分析。模型(1)检验的是内部控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内部控制质量(LnIC)的回归系数为0.975,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内部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显著正相关,即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可以显著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假设1得到支持。模型(2)检验的是内部控制对代理成本的影响,内部控制质量(LnIC)的回归系数为-0.0282,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内部控制与代理成本负相关,假设2得到支持。

表4的回归结果显示,模型(1)的总效应显著($\beta_1 = 0.975, p < 0.01$),具备探讨中介效应存在的可能;模型(2)中的中介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作用显著($\alpha_1 = -0.0282, p < 0.01$),且模型(3)中的中介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作用显著($\eta_2 = -1.248, p < 0.01$),说明中介效应存在。进一步分析发现,模型(3)中的直接效应显著($\eta_1 = 0.924, p < 0.01$),说明代理成本在内部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即内部控制可以通过降低代理成本来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表5列示了不同产权性质下内部控制、代理成本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回归结果。模型(1)中内部控制质量(LnIC)的系数分别为0.766和1.130,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内部控制效果更显著。在模型(2)的结果中,非国有企业的内部控制降低代理成本的效果更好。同样地,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均存在且显著。 $\alpha_1 \times \eta_2 / (\alpha_1 \times \eta_2 + \eta_1)$ 表示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可以衡量中介

表4 回归结果

| 变量 | 模型(1) CSR | 模型(2) AC | 模型(3) CSR |
|-------------------------|-----------------------|-------------------------|-----------------------|
| LnIC | 0.975*** (19.33) | -0.0282*** (-7.73) | 0.924*** (18.39) |
| AC | | | -1.248*** (-11.99) |
| State | 0.0509** (2.50) | -0.00862*** (-3.54) | 0.0385* (1.90) |
| Size | 0.166*** (18.09) | -0.0164*** (-17.08) | 0.144*** (15.46) |
| Lev | -0.728*** (-16.71) | -0.0218*** (-5.50) | -0.779*** (-17.89) |
| Growth | 0.116*** (7.18) | -0.0291*** (-25.07) | 0.0810*** (4.97) |
| Tds | 0.0109 (0.69) | 0.000804 (0.60) | 0.0116 (0.74) |
| Top5 | 0.00161*** (3.12) | -0.000280*** (-5.33) | 0.00116** (2.24) |
| Audit | 0.0287 (0.78) | 0.00305 (0.79) | 0.0432 (1.18) |
| Indp | -0.0436 (-0.30) | -0.00646 (-0.52) | -0.00555 (-0.04) |
| Mo | 0.0942** (2.03) | -0.0126** (-2.54) | 0.0777* (1.68) |
| Lnds | -0.00633 (-0.14) | 0.000669 (0.16) | 0.00317 (0.07) |
| Lnsal | 0.161*** (12.62) | 0.00315*** (2.61) | 0.165*** (13.02) |
| Constant | -3.619*** (-8.27) | 0.617*** (18.56) | -8.038*** (-21.16) |
| Year/Industry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Observations | 10769 | 10769 | 10769 |
| Adjusted R ² | 0.351 | 0.349 | 0.359 |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效应的强度。进一步分析发现,在不同的产权性质下,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大小分别为 1.34% 和 5.17%,说明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假设 4 得到支持,即相对于国有企业,在非国有企业中,内部控制可以更加有效地通过抑制代理成本来提高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水平。

表 5 基于不同产权性质样本的回归结果

| 变量 | State = 1 | | | State = 0 | | |
|-------------------------|-----------------------|------------------------|-----------------------|-----------------------|-------------------------|-----------------------|
| | 模型(1) | 模型(2) | 模型(3) | 模型(1) | 模型(2) | 模型(3) |
| LnJC | 0.766*** (9.89) | -0.00786** (-2.30) | 0.743*** (9.61) | 1.130*** (16.90) | -0.0438*** (-7.10) | 1.056*** (15.89) |
| AC | | | -1.286*** (-4.94) | | | -1.227*** (-11.50) |
| Size | 0.152*** (9.12) | -0.0106*** (-8.86) | 0.137*** (8.10) | 0.174*** (15.54) | -0.0200*** (-14.29) | 0.145*** (12.77) |
| Lev | -0.957*** (-11.25) | -0.0209*** (-4.11) | -0.996*** (-11.67) | -0.607*** (-12.16) | -0.0238*** (-4.28) | -0.666*** (-13.39) |
| Growth | 0.150*** (4.47) | -0.0203*** (-14.03) | 0.121*** (3.58) | 0.0908*** (5.18) | -0.0342*** (-21.12) | 0.0530*** (3.00) |
| Tds | 0.0467 (1.23) | -0.000120 (-0.07) | 0.0457 (1.21) | 0.00386 (0.24) | 0.00149 (0.83) | 0.00533 (0.33) |
| Top5 | 0.00171* (1.65) | 0.0000381 (0.54) | 0.00170 (1.64) | 0.00192*** (3.26) | -0.000364*** (-4.96) | 0.00125** (2.13) |
| Audit | 0.0550 (1.00) | -0.000868 (-0.23) | 0.0616 (1.12) | 0.0264 (0.48) | 0.00129 (0.18) | 0.0403 (0.74) |
| Indp | -0.0755 (-0.30) | -0.00777 (-0.59) | -0.0693 (-0.27) | 0.0468 (0.26) | -0.00145 (-0.08) | 0.0857 (0.48) |
| Mo | -0.309 (-0.49) | 0.0369 (0.89) | -0.317 (-0.50) | 0.124*** (2.83) | -0.0116** (-2.00) | 0.107** (2.46) |
| Lnds | -0.00247 (-0.03) | -0.00363 (0.80) | 0.00321 (0.04) | 0.0318 (0.57) | 0.000181 (0.03) | 0.0413 (0.75) |
| Lnsal | 0.212*** (8.22) | -0.00183 (-1.25) | 0.207*** (7.99) | 0.124*** (8.64) | 0.00633*** (3.67) | 0.134*** (9.36) |
| Constant | -2.430*** (-3.84) | 0.504*** (8.99) | -7.119*** (-11.47) | -9.752*** (-19.74) | 0.743*** (13.96) | -8.661*** (-17.38) |
| Year/Industry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Observations | 4086 | 4086 | 4086 | 6683 | 6683 | 6683 |
| Adjusted R ² | 0.395 | 0.276 | 0.393 | 0.329 | 0.327 | 0.342 |

(四) 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以下稳健性检验:首先,我们用总资产周转率替代中介变量进行回归检验,结果如表 6 所示,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著,在国有企业样本和非国有企业样本中,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大小分别为 2.29% 和 2.67%,支持本文所得研究结论。其次,我们变更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采用 Sobel、Goodman—1 (Aroian)、Goodman—2 统计量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7 所示。从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出,不论是全样本还是不同产权性质的样本,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的回归结果均显著。全样本中中介效应与总效应之比为 5.67%,国有企业样本中中介效应与总效

表 6 回归结果与中介效应稳健性检验

| 变量 | 全样本 | | | State = 1 | | | State = 0 | | |
|-------------------------|-----------------------|---------------------|-----------------------|----------------------|---------------------|----------------------|-----------------------|---------------------|-----------------------|
| | 模型(1) | 模型(2) | 模型(3) | 模型(1) | 模型(2) | 模型(3) | 模型(1) | 模型(2) | 模型(3) |
| LnJC | 0.838*** (15.26) | 0.101*** (6.48) | 0.816*** (14.84) | 0.679*** (8.01) | 0.074*** (3.33) | 0.663*** (7.83) | 0.924*** (12.71) | 0.120*** (5.48) | 0.901*** (12.36) |
| AC2 | | | 0.213*** (5.46) | | | 0.210*** (3.08) | | | 0.206*** (4.33) |
| Constant | -8.328*** (-12.06) | 2.623*** (13.71) | -8.791*** (-12.73) | -7.563*** (-5.96) | 3.881*** (11.59) | -8.379*** (-6.48) | -8.645*** (-11.73) | 2.613*** (11.82) | -9.184*** (-12.31) |
| Adjusted R ² | 0.146 | 0.255 | 0.149 | 0.193 | 0.293 | 0.195 | 0.130 | 0.262 | 0.133 |

应之比为 3.72%,非国有企业样本中中介效应与总效应之比为 6.40%,这说明相对于国有企业,在非国有企业中,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更加显著,即非国有企业通过内部控制降低代理成本来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效果更显著。稳健性检验结果同前文保持一致,说明本文所得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 2012—2016 年我国 A 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对象,以代理成本作为中介变量,探讨内部控制、代理成本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内部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即有效的内部控制可以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2)内部控制与代理成本呈负相关关系,即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代理成本越小,这验证了内部控制在缓解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代理冲突、降低代理成本方面的积极作用。(3)代理成本在内部控制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影响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中内部控制通过降低代理成本来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效果更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非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提高更容易通过内部控制来实现。

基于所得研究结论,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1)政府相关部门要继续推进内部控制制度在企业内部的建立与完善,保障企业经营合法合规、财务报告信息真实完整、资产安全等,同时要维护股东、债权人、员工、政府等相关利益者的权益,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2)建立和完善内部控制制度,要重点解决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问题,缓解股东与管理层的利益冲突,避免管理层实施不利于企业发展的行为,降低潜在的企业社会责任风险。(3)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要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加快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的步伐,制定出与企业实际情况相符的内部控制制度,优化企业的信息环境,降低信息的不对称程度,缓解代理冲突,进而提高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水平。

参考文献:

- [1]李志斌.内部控制、实际控制人性质与社会责任履行——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经济经纬,2014(5):109-114.
- [2]彭珏,陈红强.内部控制、市场化进程与企业社会责任[J].现代财经,2015(6):43-54.
- [3]张礼涛,王建玲.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的影响[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55-62.
- [4]李诗田.合法性、代理冲突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D].广州:暨南大学,2009.
- [5]李姝.基于代理成本理论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动因研究[C].第五届中国管理学年会论文集,2010.
- [6]雷振华.股权性质、代理成本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1):201-212.
- [7]杨风,柯艳蓉,童飞.代理冲突与企业社会责任:基于内部人控制视角[J].财会月刊,2018(1):47-54.
- [8]Haleblian J, Finkelstein S. Top management team size, CEO dominance, and firm performance: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environmental turbulence and discretion[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3,36(4):844-863.
- [9]Kim Y, Myung S P, Wier B. Is earnings quality associated with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J]. The Accounting Re-

表 7 Sobel-中介效应检验

| | 全样本 | State = 1 | State = 0 |
|---------------------|----------|-----------|-----------|
| 中介效应(代理成本) | 0.082*** | 0.047*** | 0.105*** |
| Sobel 检验 | (8.927) | (4.196) | (7.742) |
| Goodman 1(Aroian)检验 | (8.913) | (4.167) | (7.727) |
| Goodman-2 检验 | (8.941) | (4.225) | (7.757) |
| 直接效应(内部控制) | 1.373*** | 1.213*** | 1.537*** |
| | (25.536) | (14.409) | (21.821) |
| 总效应 | 1.456*** | 1.261*** | 1.642*** |
| | (27.123) | (14.991) | (23.416) |
| 中介效应与总效应之比 | 0.0567 | 0.0372 | 0.0640 |

- view, 2012, 87(3):761-796.
- [10] 李易坤, 俞潇敏, 程心悦. 从内部环境视角看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以哈药事件为例[J]. 会计之友, 2012(5): 31-32.
- [11] Abbott L J, Parker S, Peters G F, et al. Corporate governance, audit quality, and the sarbanes-oxley act: Evidence from internal audit outsourcing[J]. Accounting Review, 2007, 82(4):803-835.
- [12] 魏明海, 陈胜蓝, 黎文靖. 投资者保护研究综述: 财务会计信息的作用[J]. 中国会计评论, 2007(1):131-150.
- [13] 杨玉凤, 王火欣, 曹琼.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与代理成本相关性研究——基于沪市 2007 年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J]. 审计研究, 2010(1):82-88.
- [14] 杨德明, 林斌, 王彦超. 内部控制、审计质量与代理成本[J]. 财经研究, 2009(12):40-49.
- [15] 卢代富. 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学与法学分析[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2.
- [16] Johnson R A, Greening D W. The effect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institutional ownership types on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9, 42(5):564-576.
- [17] 宋建波, 李爱华. 企业社会责任的公司治理因素研究[J]. 财经问题研究, 2010(5):23-29.
- [18] 陈智, 徐广成.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实证分析[J]. 软科学, 2011(4):106-111.
- [19] 杨雄胜. 内部控制理论研究新视野[J]. 会计研究, 2005(7):49-54.
- [20] 王海兵, 伍中信, 李文君, 等. 企业内部控制的人本解读与框架重构[J]. 会计研究, 2011(7):59-65.
- [21] Grossman S J, Hart O D. An analysis of the principal-agent problem[J]. Econometrica, 1992, 51(1):7-45.
- [22] Ashbaugh-Skaife H, Collins D W, Jr W R K, et al. The effect of SOX internal control deficiencies and their remediation on accrual quality[J]. Accounting Review, 2008, 83(1):217-250.
- [23] 毛洁. 内部控制、资本结构与代理成本——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 财会通讯, 2012(6):87-90.
- [24] 崔秀梅, 刘静. 市场化进程、最终控制人性质与企业社会责任——来自中国沪市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软科学, 2009(1):30-38.
- [25] 冯丽丽, 廖海霞, 宋绍清. 内部控制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影响的实证检验[J]. 统计与决策, 2015(20):175-178.
- [26] 赵蓓, 吴芳, 张岩. 企业可见度、社会责任与绩效[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3):20-28.
- [27] Ang J S, Cole R A, Lin J W.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 Journal of Finance, 2010, 55(1):81-106.
- [28] 温忠麟, 张雷, 侯杰泰, 等.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 心理学报, 2004(5):614-620.

[责任编辑:王丽爱]

Internal Control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erformance: Mediating Effect Test Based on Agency Cost

LI Lanyun, WANG Zonghao, KAN Lina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an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 710021, China)

Abstract: Taking China's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2 to 2016 as research sample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intermediary model with agency cost as the mediating variable, and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internal control on agency cost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s well as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agency cost.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internal control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agency costs play a part of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internal control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Namely, internal control can promote the fulfillmen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by reducing agency costs. Further research finds that compared with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gency cost has a more significant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internal control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Key Words: internal control; agency cost;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rporate governance; capital structur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marketization process; information disclosure quality